

Traumatic Memory and the Publicization of Mour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101 Partners' Memorial

Yu-Ling KU

創傷記憶與哀悼公共化：
以台北 101 伙伴碑為例^{*}

顧玉玲^{**}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出精確且具啟發性的意見，促使本文大幅修訂，並向文中所有受訪者及編審勞務致上謝忱。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副教授，北藝大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研究所博士，學術專長為記憶政治、國際遷移、性別研究。曾任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秘書長，全程參與伙伴碑的籌建過程。聯絡方式：yulingku@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探究台北 101 伙伴碑的建造始末，回溯 331 工殤事件的集體記憶：從摩天大樓的風光與風險，到災難發生後促成勞工安全法令修改，以及勞資政協商建立工殤紀念碑，籌備過程的政治角力；最終以工殤家屬的口述歷史重建敘事主體，呈現五個勞動家庭遭逢職災後的生計、離散問題，以及倖存者經由夢魘、失眠、流淚一再重返的創傷。並延伸探討以下問題：公開的集體悼念，與個別亡者家屬的創傷經驗，發生什麼樣的連結或排斥？創傷是可以轉化的嗎？無法或不願被納入集體的個別創傷，經驗了什麼？如何連結矛盾的社會事實，以及未完成的哀悼？

研究發現：一，當事人的創傷需要時間轉化，也需要集體支撐。失去至親的工殤家屬，在個人思念與公共紀念之間，至少要歷經排斥—接受—認同的漫長時間差，且未必能獨自走到認同。二，建碑是哀悼公共化的起點，需要社會關注來錨定紀念意義，始得以承接工殤家屬的創傷。三，集體記憶若只聚焦在高樓的消費亮面，卻迴避建造過程的犧牲暗面，才是真正的殘酷不仁。而創傷記憶惟有經過民主參與、公共哀悼，才得以轉化意義。

關鍵詞：台北 101 伙伴碑、331 工殤事件、集體記憶、創傷、哀悼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ipei 101 Partners' Memorial traces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revisi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occupational incident caused by the 331 Earthquake. It encompasses the journey from the glamour and risks of skyscrapers to the modification of labor safety laws after the disaster, as well as the labor-management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morial for the deceased workers. The political maneuvering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ultimately redefines the narrative through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workers. It presents the livelihood and dispersion issues faced by five labor families after 331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the trauma survivors repeatedly reliving through nightmares, insomnia, and tears. Between the public mourning and the individual traumas of the deceased's families, what kind of connections or rejections occur? Can trauma be transformed? What do individuals who can't or do not wish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How to connect contradictory social facts and unfinished mourning?

The stud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rauma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time and collective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of workers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ere is at least a long gap between personal remembrance and public memorialization, and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reach acceptance alone. Second, erecting a memorial is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public mourning. Without follow-up actions, unfinished mourning cannot fully address the traumas of the families of deceased workers. Third, if collective memory only focuses on the bright side of consumption in high-rise buildings while avoiding the sacrifices made during construction, that is true cruelty and lack of humanity. Traumatic memories can only be transformed through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mourning to give them meaning.

Keywords: the Taipei 101 Partners' Memorial, the occupational incident caused by the 331 Earthquake, collective memory, trauma, mourning

一、前言

紀念碑作為史料載體，本身即帶有高度的政治作用，是集體記憶固著化的重要呈現。2007 年 4 月 28 日，台北 101 大樓前正式豎立一座工殤紀念碑，命名為「伙伴碑」（參見圖 1）。揭碑典禮在夜間進行，由台北 101 出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共同策畫，邀請移工、工傷者、工會幹部出席，並由工殤者陳又禎的兄長陳思勳致辭，他自擬的講辭慎重地寫滿了 A4 紙（參見圖 2）：

陳又禎生前每每都驕傲地提到自己參與了世界最高樓的興建，常常清晨五點上工、晚上十點才回家，但沒想到卻因為工安傷亡而去世，感謝所有讓紀念碑落成努力過的團體及個人，為這些背後勞工英雄豎立紀念碑，它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提醒大家後面默默付出的勞工，有更多的人身保障，他們的生命絕對不比任何人來得貧賤。（苦勞報導 2007/4/30）



← 圖 1：台北 101 伙伴碑夜間點燈。
顧玉玲攝，2007 年

↓ 圖 2：伙伴碑揭碑儀式，陳又禎的哥哥陳思勳自擬講稿致辭。
顧玉玲攝，2007 年



伙伴碑設立於台北 101 信義路側的南方廣場，介於辦公大樓與購物中心之間的人行道上，由七面 3 米高、2 米寬、厚 80 公分的立體彩色琉璃牆組成，上面滿佈人名。第一塊碑的正面碑文，銘刻下 2002 年因 331 地震引起興建中的台北 101 工地發生重大職災而辭世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及一年後在同一棟大樓感電死亡的工人張達權，以示工殤悼念，更作為勞安警惕。最後一塊碑的背後，則排排列出這座摩天大樓的出資公司及建造團隊。其中不乏本土大財團及國際營造商，最下面則列名共同建碑團體，含設計碑體建築師事務所，以及與資方協商四年餘的工傷協會、工委會、及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以組織列名，也突顯出錢出力、共同參與的意涵。

在人潮絡繹不絕的信義商圈，伙伴碑佔地既廣，色彩鮮明，夜間點燃磚內燈火照出璀璨七彩，至今早已成為台北市的重要地景，觀光客拍照打卡的熱點。數年前的相關研究，曾針對伙伴碑與觀者之間的互動，設計多次導覽活動，並針對特定觀眾進行觀眾研究的調查，以了解伙伴碑的造型、碑文、設計及動線與當初紀念意義的連結。該研究指出碑文試圖遮掩工殤所呈現的矛盾張力，以及主碑體的姓名排序所呈現的階級、族群及性別意義，並整理觀眾的觀後詮釋和對未來發展的看法（顧玉玲 2020）。本文延續之前針對伙伴碑的現象研究，回溯探討伙伴碑設立之前的工殤事件，在社會關注與職災補償之間，如何促成建碑行動？勞資政如何協商伙伴碑的歷史詮釋、紀念主體？驟失親人的亡者家屬，其創傷經驗如何與建碑籌備互動？更進一步，公開的集體悼念，與個別亡者家屬的創傷經驗，發生什麼樣的連結或排斥？再者，創傷是可以轉化的嗎？無法或不願被納入集體的個別創傷，經驗了什麼？事件至今二十年，亡者家屬如何審視個人思念與公開紀念的距離？

本文以台北 101 伙伴碑作為研究對象，使用檔案資料蒐集、實地踏查、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探討紀念主體及詮釋的權力結構，重建多元歧異的歷史敘事。伙伴碑來自 2002 年的 331 大地震，本文使用事發當時的媒體報導，以及勞資政三方籌建伙伴碑的協商會議記錄，再蒐集大量文獻資料、研究報告、工安檢討等歷史檔案，重構伙伴碑的建碑脈絡。建碑籌備會議由勞資政三方組成，自 2002 年至 2007 年揭幕為止，長達四年十六次會議。會議記錄由資方完成，每次會議送交台北市政府及工傷協會、工委會，記錄只有簡單的決議。此外，

由於我全程參與協商、進行書面化的內部報告，留下協商過程的細節與利害盤算，這些資料也都保留在工傷協會，可接受公開索閱。至於台北 101 的公開資料中不曾提及伙伴碑，我曾主動去函要求訪談事發當時的副總經理林鴻明，但遭事忙為由婉拒。而相關伙伴碑資料，台北 101 回覆信件裡也只有當年揭牌時的剪報記錄。故關於資方意見，只能部分引用 2022 年出版的《從 0 到 101：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胡芝寧 2022）（以下簡稱《從 0 到 101》），全書以宏國建設副董事長林鴻明的口述記錄為主，詳述台北 101 的建造過程及初期營運，其中也提及 331 地震的工殤事件、伙伴碑設立的過程及意義。331 工殤事件發生時，林鴻明作為施工期間及營運初期的主要負責人，曾親身參與建碑會議、揭牌儀式。當台北 101 官網遍尋不著伙伴碑的相關記錄，林鴻明作為資方當事人的口述，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於建碑過程長達五年餘，且多圍繞著選址、設計等具體細節討論，除了一開始推動建碑的行動會一一諮詢 331 亡者家屬，且邀請部分家屬共同出席討論，但之後的建碑會議，多由工傷協會、工委會、北市產總的組織工作者代表勞方出席。只在達成階段性協商時，再分別知會亡者家屬，且部分家屬已然搬家、失聯，更多家屬忙於工作無暇請假與會，委託工傷協會全權代理。可以說，331 工殤是催生伙伴碑的事件，但由於勞工家庭的資源與條件有限，之後的籌備建碑，主要還是由工運組織緊咬不放，直至揭牌當日，也只有前述工殤者陳又禎的哥哥到場致辭，其餘家屬多不想再回憶傷心事。

驟失親人的創傷如此沉重，多數人選擇不再翻攪記憶。331 至今逾二十年，是否有機會得以拉出距離，與亡者家屬討論這個歷程，以及他們對於伙伴碑的感受？或者，紀念碑從來不是他們悼念親人的投射？本研究重新尋找亡者家屬的連絡方式，過往的區域電話早已換碼，手機也多半失聯，相關團體找不到可用的連絡方式。最後經由信件、實地探訪，重新建立亡者家屬的連絡網，一一去電，再進行個別的口述歷史訪談，貼近當事人對工殤創傷的描述和詮釋，建構以勞動者家庭為敘事主體的工殤故事，記錄五個勞動家庭遭逢職災後的生計或離散困境，以及對伙伴碑在不同階段的感受，探討創傷記憶與公共哀悼的關連。

口述歷史的參與者，多是相對缺乏書寫條件的弱勢群體，因而能拓寬歷史

的人民面向，帶來歷史記憶的多元與活力，有助於社會階級之間、代際間的接觸及由此而來的理解（Thompson 1978；Portelli 2016(1991)；楊祥銀 2004）。針對亡者家屬，我特別在意他們在經驗什麼？追究失去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後，對家庭的衝擊，以及建碑對亡者家人的意義。過往難尋，我有時間的急迫性，想藉著伙伴碑的集體記憶猶新，來得及留下工人家屬的第一手資料，不致被淹沒在主流歷史的長河底層。



圖 3：331 地震導致兩架塔吊機從二百多公尺高的頂樓工地，連人帶車往下墜落。鄭貴恆攝，2002 年



圖 4：331 工殤的罹難者超薦法會。顧玉玲攝，2002 年



圖 5：伙伴碑第一面磚牆上，鏤刻主碑文及六名工殤亡者的姓名。顧玉玲攝，2022 年

二、集體記憶與創傷論述

全世界都有針對創傷經歷而設的紀念建築，表現形式可能是紀念碑、紀念館、博物館，或是歷史場址，搭配衍生的也許是紀念儀式、節日、活動等公共形式。創傷記憶以具體可見的物質或行動，作為悼念死者的依據，同時也形成內聚的動能，向過往致敬或反省。紀念活動中，參加者多是未曾親臨其境的人，偶有少數倖存者以見證方式提出證詞，加深了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人們透過儀式、媒體、口傳共享了這個集體記憶，甚或成為文化傳承的一部分（Halbwachs 1980(1950); Assmann 2012; Hirst et al. 2018）。紀念碑、紀念日、紀念館、紀念儀式都在佐證並延續集體記憶，傳授下一代，納入正式的歷史。珍妮佛·羅伯森（Jennifer Roberson 1991: 5）因而提出，歷史不是過去的事件，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連：這些關連的元素不能憑空捏造，建基於一定的客觀史料，但是這些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敘事與推論，則反映了特定時空的價值取向，集體記憶因而也是變動的。

詹姆斯·楊（James E. Young 1993: 13）研究集體記憶，探討「這個時代的公共記憶為何及如何被紀念事件、紀念館與紀念日所形塑」，指出當代被選擇的紀念日、紀念碑及儀式，決定了什麼是重要的、被公眾認可的。這些事件有了明確的公共性，以視覺化或文字化的敘事流傳於世，既是教育民眾，也對事件賦予歷史意義。凡此種種，都足以建構社會價值，甚至使人們重新定義身分。也就是說，即便過往的事件依時序線性積累，構成了現在的認識，但過往的集體記憶，由現在來決定哪些要傳承，哪些要重建，甚至哪些要遺忘。當下紀念的選擇與詮釋，也已經在介入過往，形成歷史（Connerton 1989; Young 1993; Urry 1996; Butler 2006; Harrison 2008; Simine 2013）。特別是統治者為了正當化其統治基礎，紀念物或紀念行動就不免帶有強化主流價值的政治企圖。於是，分析紀念背後的權力結構，就成為記憶研究不可避免的議題。

個人記憶需要集體記憶的支撐、強化，無以獨立完成。創傷經驗若要成為文化記憶的一部分，多半也需要與權力的正當性有所連結（Herman 1997; Assmann 2012）。如果個人記憶與主流歷史互相排斥、無法相容，就會產生尖銳的矛盾，或者強迫噤聲，成為隱藏的危險記憶，成為反抗的引信（Metz 1987）。但是，晚近更多研究更提出，歷史就算可以由統治者單向定調，民間的集體記憶來源紛雜，終究無法全然排除。即便是由上而下所建造的紀念物、紀念空間，原有的歷史詮釋也未必能主導參觀者的看法。新世代或立場迥異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追憶，物件與空間和人的互動也可能產生新的意義，未必如原先所預期（Urry 1996）。以民間記憶作為研究取徑，伯維利·巴特勒（Beverly Bulter 2006: 471-473）則指出，若要求歷史完全還原真實（authentic reconstruction），多半會導致現在與過往分裂，暴露社會內部差異。而因追究歷史真相所出現的爭議與衝突，正是記憶論述內含反抗行動的政治基進性。

331 地震之後數年，台北 101 的購物中心及大樓先後開幕，伙伴碑正式揭幕。人潮聚集的 101 商圈，爾今成為台灣重要地標，不時可見逛街的行人與觀光客在七彩琉璃碑前拍照打卡。背後的摩天大樓雖已不是世界第一高，但每年的跨年煙火仍是城市的一大盛事。但伙伴碑的工殤記憶，卻罕見討論，台北 101 的官網不見任何記載與說明，也沒有後續的活動。這個紀念碑，被選擇性地建造以紀念傷痛，卻矛盾地不再傳播記憶，而工殤家屬又在經驗什麼呢？

331 記憶猶新，工殤亡者家屬雖然願意接受訪談，但回顧過往必然觸及沉重的創傷記憶。關於創傷的研究，在上個世紀末，已然不再侷限於病理化、醫療化的範疇，朝向集體的見證、進一步發展受創主體的論述（Lyotard 1990; Caruth 1996; Agamben 1999）。弗朗索尼·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90）針對創傷的主體研究，認為在創傷事件當下，當事人的痛苦有時會以「無意識感受」（unconscious affect）隱藏在表面反應下，因為太震驚而帶來麻木，甚至封閉無感。李歐塔因而強調，受創主體若要說話，未必能經由既有的語言來表達，而是通過創傷發聲，那個來自傷害的聲音，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異質的陌生性也許讓人措手不及，而那正是我們需要安靜聆聽的聲音。延續李歐塔的主體發聲，凱西·卡露思（Cathy Caruth 1996: vii-viii）更強調尊重受苦的本質，聆聽創傷主體所訴說的真理。她不同意將創傷象徵化、意義化，而更強調記憶與敘事的重要性，肯認受創主體的述說是具有創造性的行動。創傷難以言語、無法表達，發生當下，當事人多是麻木未覺，要延遲至日後才出現各種外顯的症狀（Caruth 1996: 153）。

新世紀以來更多的創傷研究，聚焦在主體的形成、變形，以及主動性。凱瑟琳·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 2012）將創傷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機體的創傷，如身體的撞擊與病變；第二類為外在自然創傷，如地震火災等重大意外事故；第三類則是社會政治性的創傷（sociopolitical traumas），如戰爭強暴等（Malabou 2012: 155）。在這個概略分類、交錯影響的創傷系譜中，她指出創傷的受害並不只是摧毀或遺忘，創傷主體是富有積極性的，他們被撞擊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新的轉換力量。受創主體的過去被改變了，成為一個新的傷者，從這樣的新傷害出發，主體成為無法以既有知識座標能夠理解的人。研究過程中，我特別看重工殤家屬的主體性，與受訪者共同討論對傷害的詮釋、受創傷的經驗帶來的磨損與潰敗。主體並非只有片面的失去與變形，也可能因而長出承受的力量，拓展理解痛苦的邊界。

關於弱勢族群的記憶研究，巴特勒（Butler 2006）主張，為了抵擋西方中心的主流文化霸權，更需要主動蒐集自身的在地經驗，並超越過去／現在的二分法。她強調，我們只能透過現在的人去了解過去，過往不在他方或異地，而是根植於我們目前行動、站立之處，經由與他者的連結與互動，重生自我認

同。工殤家屬所經驗的創傷，並不只是過去，同時也是現在進行式、未來式。研究者唯有更戰戰兢兢，承認既有的知識體系不堪使用，專注凝視、認真聆聽那些被留下來的人在經驗什麼，也許有機會為自身所處的當代記憶，留下關鍵的證辭。

三、世界第一高樓與 331 工殤

本節蒐集大量剪報、文獻資料、研究報告等歷史檔案，分別由摩天大樓興建、331 大地震與工安檢討、建碑的協商過程，四個階段還原事件始末，並整理該事件對後世的警惕與影響。

（一）摩天大樓的風光與風險

鉅型建築物經常被視為各時代的文明成就，展現科技進步、主流文化與信仰。全球都市化的過程中，摩天樓的大量興建，以其極端的垂直及集中，成為父權象徵的頂點（Weisman 2000; Graham 2016），在亞洲和中東國家的菁英階層中，更隱含著追求世界認可的政治欲望（Ong 2011）。全球第一高的摩天樓競賽，成為國族主義躍上世界舞台的證明。

台灣第一棟純鋼骨結構、突破高度限制的大樓，是 1969 年動工的台北松江路榮華大樓，由日商鹿島建設與榮工處聯合承攬。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商辦空間的需求增加，都會區人口快速膨脹，但城市土地面積有限，因而建築物開發更朝垂直發展。進入 1990 年代，因應著營造科技的高性能更新，台北高雄兩大都會區的超高層建築一再刷新記錄；¹寸土寸金的都會商圈，摩天大樓一再突破城市天際線，爭相競高。直至 1997 年，台北市政府首件土地 BOT 案，成功發包給由宏國企業等十一家企業組成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998 年正式動工，對外宣稱落成後將成為世界第一高樓，²「成為台灣迎

1 1992 年高雄長谷世貿聯合國（高 221.6 公尺）、1993 年台北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高 244.2 公尺）、1997 年高雄東帝士建台大樓（高 347.5 公尺）等，一再創新高。

2 為落實「亞太金融中心」，北市府將世貿旁的精華地段，以七十年租期簽訂給民間團體，1997 年 4 月，由宏國建設等企業團隊以 206 億 8889 萬得標，取得地上開發權。同年 8 月更改設計為 101 層辦公大樓另有 60 公尺高的裙樓為購物中心（財富時報 2008/9/25）。

向國際世界的舞台」，³「讓台灣看見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⁴第一高樓的建立，不只是經濟能力的誇耀呈現，更被賦予了出人頭地的國族展示。

台北盆地是否適宜建築摩天大樓？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就營造技術上，超高層建築施工具有整體上下重疊的作業關係，一般營造業施工步驟一項也不能少。爲了因應建築高度的物料運送不便，超高大樓的建築，施工時多採用塔式起重機進行鋼骨吊運。塔式起重機吊運的構件重、體積龐大，且機械操作有特殊性，共同作業的工種複雜：起重吊裝、校正、螺栓鎖固、焊接、鋼承板鋪設、剪力釘植焊、鋼筋及鋼絲網鋪設、打設樓板面混凝土、安全網安裝拆除等作業關係，潛藏墜落、感電、倒塌等災害風險（楊俊隆 2003: 67）。再加上台灣地處環太平洋區，常有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高達數百公尺的垂直起重吊運的施工過程，風力、震力都與平地不同，更充滿不可預測的危機。

1999 年台灣發生 921 大地震，震垮了無數樓房與人命，也引發社會對於高樓的疑慮。當時正向「世界第一高樓」目標邁進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2002 年 7 月更名為「台北 101」（大紀元 2002/7/18）），業主多次出面強調台北盆地不在地震帶上，且大樓內裝世界一流的風阻尼器，向社會大眾保證安全（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262）。什麼是風阻尼器呢？阻尼器是提供運動阻力，耗減運動能量的減震裝置，結合建築結構的動力性能，減少地震、風力的破壞：愈高處的樓層承受風力愈大，在大樓頂端裝設與大樓晃動頻率相近的單擺系統，得以運用物理學的反作用力，抵消與減緩大樓搖晃所造成的不適。同時，還需要地面層下的建築重量平衡的浮力，將地樁深根入地以平衡建築受風力或地震的擺動（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262；高橋俊介 2009: 94；胡芝寧 2022: 130-133）。台北國際金融大樓是高科技的指標，營造技術的大幅進步，帶來前所未有的防震力，不會像傳統磚樓一震就倒，居住者也會受到保護。言猶在耳，2002 年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 52 分就發生大地震了，台北市成爲最大重災區。

3 引用自官派台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爲《從 0 到 101：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寫的序文（張學舜 2022: 10）。

4 台北 101 的各種宣傳文案多次引用「讓台灣看見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

(二) 自半空中的工地墜落

331 大地震的是規模高達 6.8 的強震，從花蓮外海的震央延續至台北仍有 5 度震幅，盆地災情不斷。當時已興建至 56 樓高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高達兩百多公尺的結構體因強震晃動，樓頂兩支塔吊機具的東、西側各一支人字臂螺絲鬆脫、斷裂。數噸重的人字臂鋼鐵，一支落在裙樓的建物圓頂，另一支直接掉落松智路面，當場壓毀三輛轎車，同時也造成另三輛車半毀。這場突如其來的工安意外，致使五名建築工人不幸罹難，另有五名工人重傷，十四名民眾遭機具掉落擊中而受輕重傷。消防局出動二十多輛消防車與救護車趕抵現場，軍方也出動人力支援，警方在意外現場週邊道路圍起封鎖線。

工人從超高大樓摔落地面的新聞，震驚全台灣，各家媒體的 SNG 車都趕赴現場。許多人透過電視畫面，目睹塔吊連車帶人自半空中直接墜落、人字臂撞歪的高樓鋼骨、裙樓圓頂的殘骸，被封鎖的松智路現場被壓扁的轎車、破碎的玻璃，以及刺耳的救護車鳴叫聲。至今仍可以在 YouTube 搜索到台灣 Discovery 觸目驚心的新聞畫面，播放 331 大地震時工人與機具自半空中墜落的影片，英文旁白強調：「沒有人料到，台灣大地震的危險原來不在地面而在半空中。」⁵ 大地震遇上超高大樓，引發人心惶惶，透過電子媒體的重覆播放，成為台灣當代成年人共有的集體記憶，是我輩難以忘懷的時代印記。

這棟摩天大樓是台灣營造科技的指標性建物，耗資上億打造全球最大的風阻尼器，遠超過既有法令要求，提供最前瞻的服務品質。既保護建築物作為資產的安全性，也保護來承租辦公室的企業免於風險。建商團隊考慮了資產端，也考慮了消費端，就是不曾想到生產端的工地建造過程也有防震需求。在建造過程中，工人直接在頂樓操作的塔吊，僅符合法定的地面搖晃耐震度，完全沒有針對高樓作業特別加強防震措施。在地面所使用的防震標準，到兩百公尺高還是一樣，若再蓋到四百公尺高，應該也是一樣，沒想到結果會不一樣，因為這不是消費端。地震一來，頂樓兩具塔式吊車就因螺絲鬆脫而斷裂墜落，五名工人墜落或遭重擊身亡。

（三）災難立法與肉身菩薩

事後驗算，塔吊機的強度符合內政部於 1984 年發布的《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地震力計算以自重的 20% 為水平設計，未考量吊物的重量。經過 331 地震的工殤事件，相關研究才一一指出：若塔式起重機架設在高樓上，從底部輸入的振動有顯著放大作用，且塔式起重機與主結構體如產生共振，將使起重機的受力更加強化（蔡榮根等 2002/6/5；楊俊隆 2003；曹常成 2005）。因此，331 地震後，氣象局在金融大樓放置三個新測點，以 5 月 29 日所發生較大餘震來測試，地下 5 樓為基礎點，1 樓所受地震力已達 1.3 倍，31 樓時更高達 3.5 倍，可見再往上將會有更高的倍數（楊俊隆 2003: 122-123）。也就是說，由這個測試發現，愈高樓層的地震搖晃度愈高，30 樓高已然比一般受震力多了一倍以上，更遑論 56 樓高。

由於過往並未出現如此高樓層的事故，人為的法令只能依憑有限的經驗值換算。當強烈地震發生時，安裝在 56 樓高的塔吊設備所承受的搖晃度，已遠遠超過原本依地面標準所設計的安全係數。《台北國際金融中心新建工程 331 震災塔吊掉落事故原因鑑定報告書》（蔡榮根等 2002/6/5）因而指出：「塔吊安裝於超高大樓上，爬昇至一定高度以上，塔吊承受地震力之放大效應就會非常明顯，傳統靜態分析設計已難適用。」建議台北金融大樓的復工計畫應另依塔吊爬昇的不同階段，以動力分析結果設計合宜的地震承受度。之後，行政院勞委會草擬新的塔式起重機耐震設計規範，特別針對超高建築物的塔式起重機作業，要求進行微震測析，加強地震防墜落等措施。2005 年 5 月 12 日，《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全文 68 條，正式發布實施。

這是典型的災難立法，都市開發的速度永遠跑在勞工安全的前面。地震頻仍的台灣，台北就算不直接處於地震帶上，震波進入盆地的鬆軟土質也會被放大，增加震幅強度；地震的搖晃固然危險，但若非處於高樓也不致擴大風力及震力的搖晃度，更何況是肉身懸掛在高空的作業工人、或置身頂樓塔吊中的操作員。盆地、高樓都是擴大震幅的首要因素，但直到林建成、陳錦水、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五名工人付出性命代價，才引發台灣針對摩天大樓的施工安全係數有了新的檢討與規定。

工人在勞動中失去性命，他們生產的成果供眾人享用，生產過程中若有任

何不當業力，也被他們先於眾人承接了。他們的犧牲，若能激起社會反省，改變原本不夠完整的政策，讓未來繼續在高樓工作的人，多一點安全保障；又或者讓人們了解到，愈趨難度超高的工程永遠沒有足夠的安全指標，因為那超乎人類的經驗值，不能只有基本安全網，而要以最高標準阻止可能的傷害。就這個意義上，伙伴碑上的工殤亡者宛如菩薩，以肉身度化眾生。

四、建碑的政治角力

工殤碑多來自災難。331 大地震導致五名施作工人自高樓跌落死亡，引起社會譁然。當時的中央、地方政府爭相發放死亡補助金額（林淑玲 2002/4/1），台北市勞工局、中央勞委會也先後主動慰問工人家屬，故而職災理賠的處理相對順利許多。同年 4 月 4 日，民間的勞工團體⁶前往台北市政府，要求市府能在象徵台灣經濟發展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建立工殤紀念碑。在新聞熱潮的社會壓力下，台北市政府率先同意並積極促成，金融大樓公司也承諾以建碑悼念五名工殤亡者，肯定勞工對台灣經濟的奉獻，宣示由官、資、勞三方結合建築專業人士共組「工殤碑籌備小組」。歷時四年餘會議，建碑工作小組協商多次，決議將所有參與興建大樓者的姓名併列，命名為「伙伴碑」。

2007 年 4 月 28 日，「伙伴碑」正式揭碑——這成果固然部分來自工運團體長期推動建碑的努力，⁷但還有當時的客觀外在因素。金融大樓的土地並非私人財產，而是台北市政府所有，因此官方的態度有關鍵性的作用。331 大地震同年，《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正式公布實施，法令中明訂 4 月 28 日是工殤日、應建立工殤碑，提供建碑的合法性及正當性。因應職保法實施，首度執政的民進黨總統府，立即宣佈將在高雄建立全國性工殤碑，以示照顧工人的決心。這讓當時的台北市長、國民黨籍的馬英九願意配合推動建碑，以爭取進步形象。此外，長期推動工殤碑的工運人士鄭村棋擔任台北市勞工局局長，在 331 工殤事件後，以勞動檢查強力介入國際金融大樓的工地安全，勒令停工調查，也對

6 共有工傷協會、工委會、北市產總、倉運聯、台北捷運工會等四十餘個自主工運團體參與連署行動（工委會、工傷協會 2002/4/26）。

7 1993 年 11 月 12 日秋鬥遊行，工委會、工傷協會提出工殤碑的運動訴求，並推動工人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的立法行動。爾後於 1999 年、2000 年先後建立台北捷運新店線及板橋線的「潛水夫症勞工紀念碑」。

資方形成具體壓力。

綜合上述，工殤碑得以順利推動，並非工人實力與社會討論的條件俱足，而有外在的政治條件與社會壓力，因而在勞資政三方協商建碑的過程中，不免有許多的爭執、衝突與妥協。這個漫長的協商過程，331 工殤家屬多有各種實質因素無法參與，⁸最核心的困難還是經濟，勞動家庭頓失主要收入，活著的人大多忙於生計與重整生活，並無餘裕再參與公共討論。得以全程參與協商的，還是工傷協會的組織工作者，和資方代表纏鬥不休。⁹從 2002 年 5 月起召開建碑籌備會議起，從選址、造型、材質、碑文、命名、經費等，都是複雜的政治角力：

（一）碑址與空間配置：不問蒼生問風水

台北 101 的建商也是經營團隊，故而資方一直想限縮工殤碑的能見度，以迴避職災記憶，在選址上多次挑選背對大樓的北方廣場、花園等鮮少人潮之處，指稱沒有多餘空間，實則是擔心晦氣丟臉；但勞方要求紀念碑就應明顯可見，「與主建築物靠近，有人潮，獨特完整的空間」（顧玉玲 2002/10/15）是主要考量。雙方多次赴現場探勘，對照大樓的空間規劃圖而僵持不下。

由於勞方無法確實掌握施工配置圖，只能在資方提供的有限地點做選擇，一再被限縮空間配置。因此，當雙方因選址僵持不下時，勞方提出的解套方式是不必再另覓碑址，而使用現有的辦公大樓一樓的巨大透明牆面，刻上參與大樓建設的工人姓名，擴大工殤悼念至感謝所有的勞動付出。以上萬名勞心、勞力的工人姓名作為紀念碑的主體，當人們出入大樓時就會看見他們的名字，就在象徵金融高位的摩天大樓最基層的位置，像寺廟的樑柱刻上香客姓名一樣。此提案夾帶內容與形式相輔相成，最重要的是，一舉翻轉死亡陰影，很快獲得勞資共識。¹⁰但資方仍是反對以大樓牆面替代碑址，終究那是出入的門面。

8 如林建成家人遠居高雄大寮，陳信陽妻子搬離婆家失去聯絡，孫同英父親重聽不適，陳又禎父親搬至山區禮佛，陳錦水妻子罹病、兒子們年幼……各種因素。主要還是經濟弱勢，沒有條件與心力參與。

9 從 2002 年 5 月 29 日至 2007 年 4 月 28 日共歷時四年許，勞資政三方召開建碑工作小組，留有正式會議記錄共十六次，由台北國際金融中心公關室記錄，電子檔案留存於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台北國際金融公司、工傷協會、工委會（其中一次會議記錄詳見附錄）。期間，台北市政府的官方代表只宣誓性出席第一次會議，就放手由勞資雙方協商，俟定案後再出席見證。

10 詳見建碑工作小組第五次會議記錄，2002/7/26。但在林鴻明的口述記錄中，卻將勞資政建碑

最終工殤碑址的定奪，並非經由理性協商、實力談判，而是由台北 101 的風水大師解套。第八次籌備會議結束後，資方臨時通知：「風水大師對目前作品深感意義重大，因此建議一個新設置地點，對作品及本案均相得益彰」，¹¹ 要求緊急加開籌備會議。台北 101 的風水師以有利於台北 101 營運的考量，提議工殤碑設立於台北 101 面對信義路側的廣場。這個位置介於台北 101 辦公大樓與購物廣場之間人行道上，是醒目、人多、易親近之處，且鄰近預定捷運站出口，遠遠優於之前一整年探勘、協商的地點，立即獲致勞資政三方共識。¹² 之後在建碑過程中，資方曾以向建商募款不足為由，打算變更設計將伙伴碑上的人名字體縮小、磚牆數變少、空間範圍裁減，¹³ 引發勞資雙方協商以來最激烈的衝突。勞方認為，資方片面以經費為由緊縮伙伴碑，對勞動者不公平，對亡者不尊重，主張由工運團體公開發動社會募款完成伙伴碑。最終，資方擔心工人行動使台北 101 形象受損，還是依原計畫設立「伙伴碑」，於 2007 年 4 月 28 日正式落成點燈。¹⁴

台北 101 當時是世界第一高樓，每年跨年煙火都聚滿了人潮，樓頂的跑馬燈廣告費用驚人，其宛如竹節般倒杯疊高的意象，更成為台北市的觀光指標。摩天大樓標榜現代、文明、國際化，但在建碑選址上卻依賴最傳統的風水師建言：原本想閃躲、遮蔽的工殤記憶，最後以最醒目明亮的方式呈現，是勞資雙方始料所不及。伙伴碑豎立在台北 101 最主要的門面前，雖說是風水師指示的「天意」勝過現實的政治角力，卻也在碑文敘事中留下矛盾與張力。

（二）碑文與命名：工殤碑不能有「工殤」二字

資方同意建碑，但對死亡頗有忌諱，從第一次建碑會議提出的六則碑文草

籌備會的決議，誤植為「營運團隊幾經思考」後的決定，列名參與者是為了「在這士氣低落時，激勵鼓舞團隊」（胡芝寧 2022: 225）。

11 建碑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記錄，2002/10/4。

12 建碑工作小組第九次會議記錄，2002/10/8。

13 裝置藝術家原本以一萬多個名字清楚可見的字體所能容納的面積，設計了九面碑牆，但後來建商收集來的名單只有九千多個，因而磚牆減至七面，勞方也無異議接受。不料台北 101 董事會改組後，原負責協商的副總沈雲飛被調職，新任總經理林鴻明卻提出變更設計，因建碑預算一千八百萬但向建商募款不足，故將伙伴碑縮建為三面碑牆。

14 揭碑典禮由工運團體主辦，邀請工殤家屬、工傷者、移工、工會幹部共同參與，選擇在夜間舉行揭碑典禮，一來突出夜光自七彩牆內迴照而出的燦爛效果，十分耀眼吸睛；二來也是為了招待家屬及移工一起登上 89 樓的觀景台，眺望台北市燈火輝煌的美麗夜景。

稿就有意避免工殤，認為對生者致意比對亡者致哀還要重要。碑文中不願置放具體人名，只強調「行動者」或「勞工朋友」的貢獻，肯定其完成 Taipei101 的「世界新紀錄」、「砌築夢想」、「創造永垂不朽的歷史」。¹⁵ 勞方則堅持，331 事件是建碑的起點，亡者姓名在碑文中不可或缺，「工殤」二字也須留下記錄。之後，勞方整合資方提案作為主碑文，但要求文前要加上：「歷史由勞動者創造」，文末則清楚註記：「紀念 2002 年 331 地震工殤辭世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¹⁶。在碑文的爭議裡，很明顯可以看出，資方碑文以 Taipei101 大樓作為歌頌的主體，工人是對大樓的付出者、行動者；勞方則強調勞動創造價值與歷史，堅持留下 331 工殤事件與人名。

以勞動者姓名作為紀念碑的主體，331 工殤就不再是孤立呈現，讓亡者與生者同在，賦予集體支撐的意義。另一層涵義是，打破過往只有出資者、政府首長、設計者在建築物落款的慣例，積極肯定勞動者才是真正的創造者。不過，真正落實建碑時，由於名單都來自建商與包商，所以一萬個名字裡有多少基層工人不得而知，但主碑體上的姓名排序除了由總統陳水扁、市長馬英九領銜外，名列前茅的都是台北 101 開發團隊的企業負責人，形成按「政」論「資」的排序，引發伙伴碑的矛盾解讀，更具現實張力（顧玉玲 2020）。後見之明，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資方雖然同意將 331 工殤亡者姓名特別標誌在第一塊碑牆上，但強力抵制「工殤」二字，認為「會影響其他勞工放進名字的意願」。¹⁷ 資方並主動提出 2003 年還有一名水電工人張達權¹⁸ 於電梯作業中感電

15 建碑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2002/5/29。資方的六則碑文提案如下：「歷史是由一群行動者用生命所刻劃出來的紀錄—獻給刻劃 Taipei101 世界新紀錄的勞工朋友。」、「從這裡，延伸出去的每一片段、每一角落，都有他們用生命刻劃的軌跡—獻給親身參與 Tapei101 的勞工朋友」、「謹以此碑紀念在__天之中，曾有__位勞工朋友在此為 508 公尺高的 Taipei101 砌築夢想。」、「謹以此碑獻給曾經付出勞力、血汗及生命的偉大勞工夥伴。」、「路是人走出來的：Taipei101 是勞工朋友打造出來的一獻給共同打造 Taipei101 的勞工朋友。」、「沒有勞工朋友的努力付出，就無法創造永垂不朽的歷史—獻給為 Taipei101 共同努力的勞工朋友。」

16 詳見建碑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記錄，2002/6/28。勞方提案的整合碑文如下：「歷史由勞動者創造，從這裡，延伸出去的每一片段、每一角落，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獻給參與建設 Taipei101 的__位工人朋友，並紀念 2002 年 331 地震工殤辭世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

17 建碑工作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記錄，2003/4/4。

18 台北 101 在會議資料中誤植為張達全，由於無法連絡上家屬，之後的伙伴碑上、新聞稿、及相關研究論文（顧玉玲 2008）都跟著錯植，後來碑上才改正為「張達權」。我也向勞保局查詢確認，但直到 2018 年我去文台北 101 詢問伙伴碑事宜，資方（107）行字第 10705018 號文回函仍舊使用「張達全」，顯見內部資料並未更新。

死亡，要求一併列入第一塊碑的亡者名單中，如此 331 地震的字樣也只能被拿掉，以廣泛的「因工辭世」替代。到了伙伴碑驗收時刻，台北 101 資方又改以「因工往生」，表示較能被社會大眾接受。

工殤碑的內容確認後，就是命名的問題了。工傷協會張榮隆提出「伙伴」概念，取台語「作伙」、「鬥陣」之意，認為「世人所見的成就皆非以一己之力所完成，所有成就是許許多多工作伙伴所共同付出的血汗，共同打拚而成。」¹⁹ 伙伴的正向、包容性，獲勞資雙方無異議通過。²⁰ 但 331 工殤亡者家屬是否同意呢？經工傷協會一一連絡罹難者家屬，取得家屬同意將亡故親人的姓名放置於「伙伴碑」上，命名才算完全確認。十數年後，《從 0 到 101》出版，「伙伴」二字被重覆提起，用以稱呼 331 工殤亡者，也用以稱呼伙伴碑排名第一列的企業家們。當年籌組團隊催生台北 101 的林鴻明（2022），在序言中特別指出這些合作的企業董事長們，蓋造大樓的初心來自「大家都非常想為台灣做點事」，經過多年共同打拚，彼此間有深厚的革命情感，是「一輩子的伙伴們」，成為建造台北 101 的附加收穫。

紀念是單一的，記憶卻是多元的，一個伙伴碑，投射不同的、甚至是衝突的各自解讀。建碑後浮現出的種種矛盾與分裂，也許才是真正的社會現實。

（三）造型與意義：從「風獅爺」到「七巧板」

有關台北 101 工殤碑的意象，工人內部討論多次，集中在與 331 事件的連帶想像：墜落、搖晃、塔吊、壓扁的車子、驚嚇的臉孔、劫後餘生抽菸的工人，甚至是將當時蓋到 56 樓的整個樓層以紅色玻璃圍住，遠望即知。這些都是對於災難意象的強調，要在時間流中聚焦停格，以免日後被輕易遺忘。也有人提出，以台灣推動工殤碑運動的象徵木棉花作為主視覺，331 大地震事發當時正值木棉花開時節，紅色的花朵有鮮血的意象，若在金融大樓附近遍植木棉花，以活的植物替代紀念碑，也許更有意義。²¹

19 回覆我的研究詢問，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107）行字第 10705018 號函。

20 建碑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記錄，2002/10/4。原本提案「夥伴」直到揭碑前才正名為「伙伴」。

21 詳見勞方建碑會前會的會議記錄，2002/5/11。

正式的建碑籌備會前，工委會代表王耀梓率先提出金門風獅爺²²造型，取其活潑可親又有「保平安」的意涵，將最在地的民俗信仰放在最現代的金融大樓旁，也會吸引人潮以認識工殤，富教育意義。經勞工團體向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諮詢，指出風獅爺若面向金融大樓而立，還有「鎮邪伏魔」作用，因其源起本有鎮風擋煞之意，故而多設立在當風路口；以民間信仰來說，風獅爺既是守護神，也是避邪物。²³ 延伸而論，金融大樓是資本家炫耀財富與權力之處，工殤對於經濟發展的反思作用，足以鎮住金融資本的擴張與掠奪，本身就有運動上的論述意義。因此，第二次籌備會議，勞方代表正式提案，以本土草根的「風獅爺」作為工殤碑主要意象。不過，這個提案遭到資方代表及建築師李祖原的反對，認為風獅爺的造型太具象，缺乏藝術感，且人們見到神像就會插香、拜拜，過於民俗化、宗教化，與金融大樓象徵的國際化、現代化不符。之後勞方收集各地風獅爺圖像、傳說，挾神同行，強調「保平安」與「好親近」之意，且深富藝術性與想像力，但資方仍不接受民間信仰的本土意象，雙方引發數次激烈爭執。²⁴

在選址與造型的討論過程，勞資雙方也曾協商與北面廣場噴水池結合，以水流意象為主，去除傳統紀念碑硬梆梆的形象；或是以玻璃材質的壁屏，下方基座加寬成座椅；或是取消座椅，改由以不同石材組成表現不同種族、性別的伙伴共同參與的紀念碑壁屏……等。²⁵ 直到「伙伴碑」的命名確定之後，資方聘僱新加坡玻璃藝術家 Florence Ng，以「七巧板」的概念設計，其創造與勞動的雙重意象，色彩繽紛且親近民衆的童時記憶，贏得勞方代表的認同，總算定案。²⁶

（四）台北新地標，隱形工殤碑

台北 101 的識別系統由三個中國古銅錢幣造形所組成，分別代表辦公大

22 石獅鎮煞的習俗，源自閩南，如今福建、廣東、金門、澎湖、琉球皆有風獅爺，台灣本島則在台南、彰化、嘉義等地可見（黃蕙馨 2008）。

23 金門沿每風沙為患，聚落被迫遷移，故居民多在路口設置風獅爺以鎮風煞（孔憲法 1990）。當地居民視風患為邪魔妖怪作祟，風獅是抵煞、鎮風的避邪物，且獅子也是漢民族招福神獸，冠上「爺」含有對神祇的尊稱。參考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9189>。取用日期：2024/2/10。

24 建碑工作小組第二（2002/6/14）、三（2002/6/28）次會議記錄。

25 建碑工作小組第四（2002/7/5）、九（2002/10/8）、十一（2003/1/20）次會議記錄。

26 建碑工作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記錄，2003/2/29。

樓、購物中心和觀景台三個事業體，總計地上 101 層、地下 5 層，樓高 509.2 公尺。若依尖頂高度計，2004 年落成時是世界第一高樓，擁有全球最高的建築露天觀景台、最大的阻尼器、最快速電梯等。雖然至 2023 年已然跌出世界前十大高樓，屈居第十一高，但仍高踞環地震帶大樓第一名。²⁷ 這個超高大樓採用八支巨柱的設計，以透明綠的玻璃帷幕包覆全樓，27 樓以上採內斜七度的特殊構面，具有彈性及支撐力，鋸齒狀的外形能減少風力搖晃，而大樓內部巨大的風阻尼器，也得以對付強震跟颱風。建造及經營團隊對大樓自身的抗震性能十分有自信，針對 331 工殤，也一再強調與大樓的防震能力無關：「臨時性的塔吊因地震掉落，和永久性結構是不是能夠抗震，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胡芝寧 2022: 155）至今，耗資上億的風阻尼球被漆上貴氣金光，成為台北 101 的重要景點之一，遊客參觀時還有專人解說。

根據台北 101 官網的建築設計說明，每八層樓為一節，總計有八節，採吉祥數字八與「發」的諧音，倒梯形有聚寶盆的招財隱喻，由下而上望代表「節節高升」，由上而下鳥瞰則有如花開富貴。四面外牆的鑰形雕刻，代表打開財富之門，大樓外牆每八層樓就有一個採光罩的「大如意」，購物中心內部的門柱、店招等更是處處可見「中如意」、「小如意」。台北 101 大樓的設計，充滿華人文化的招財符號，與金融發展緊密結合。

當然，現代都市規劃中，除了因應商業需求，也要搭配文化提昇。台北 101 大樓依照政府頒佈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採總建築費用的千分之五作為公共藝術設置，在辦公大樓和購物中心週遭，聘請國際知名藝術家，設計了九組裝置作品，也成為官網中的誇耀重點，但其中並無伙伴碑。相較於台北 101 眾多戶外裝置藝術，伙伴碑是目測所見佔地最廣，顏色最鮮明的，但遍查台北 101 官網及現場文宣，卻獨漏這一件。伙伴碑既是目光的焦點，卻又在資料中噤聲隱形，除了語意模糊的碑文，人們看不到任何說明，也沒有網路指引，像是個未列戶的私生子。

伙伴碑的七座琉璃磚牆，因風水師的斷言，偶然地被放置在商圈最顯眼之處，卻在消費導向的競利中，必然地從台北 101 的對外宣傳中隱形。

27 上述榮譽獲獎記錄全數來自台北 101 的官網，但我抄錄至「環地震帶最高建築」時，仍不免心驚，不知這個記錄在 331 大地震死了五名工人後，何以仍屬驕傲的榮光，而非罪過的省思？

五、創傷與哀悼

331 工殤事件雖是重大新聞，但相關亡者家屬的後續報導卻非常少，各家媒體所登載亡者資料甚至多有落差。2002 年事發當時，工傷協會組織者曾一一拜訪亡者家屬，但未能完整進行職災現場的資訊勘誤，畢竟死亡如此沈重，對遽失親人的家屬來說，直接細談未免殘忍。事隔十數年，我輾轉連絡到 331 工殤家屬，經過時間的淘洗，才有機會進行口述歷史的深度訪談，重新校對工殤者個人資料、家庭背景、職種與工作內容，並詢問家屬對伙伴碑的感受。工殤亡者多半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突然過世，都造成整個家庭的陷落及生計困難。這起事件受到全台矚目，官方慰問、大型公祭、勞保給付、資方補償等接連進行，沒有太大的勞資爭議。因而在補償過程中，工運團體沒能實質介入協助、與 331 工殤家屬建立深刻關係，也無法與其他工殤者的互助網絡保持密切聯繫。而失去親人的創傷，對整個家庭造成的影響，可能要在很多年以後才會慢慢浮現。

連絡早已失聯四散的工殤家屬，耗費大量時間在空號、停機的電話號碼中無功而返，輾轉各方追查半年餘，才分別找到五名工殤者的部分家人，並逐一進行口述訪談。可惜的是，2003 年感電過世的工人張達權，名字雖也在伙伴碑的第一座牆上，但因非 331 職災亡者，報上並無報導。經我以研究伙伴碑為由多次去文，台北 101 表示張達權是層層外包的水電商工人，因大樓電梯感電過世，詳細資料則因包商早已解散而不得而知。²⁸ 我轉向勞保局查詢，也沒有張達權的死亡給付檔案。²⁹ 伙伴碑上的工殤者張達權，只能在此次研究中暫時懸缺，成為無言之人。

331 工殤事件當時，亡者家屬也成為媒體焦點，又要辦理後事又要談判賠償，多數人都無力深談，或倉忙間媒體以訛傳訛，訊息有誤。多年後，我原本擔心長時間的口述歷史訪談會過度擾動家屬，卻不料多數家屬在已無人追問此事時，竟都很願意多談談亡逝者，有關他的記憶歷歷在目，一開口就停不下來。

28 台北金融大樓公司（107）行字第 10705018 號函，及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關室回電。

29 勞保局查不到張達權的投保記錄，但有家屬於 2003 年以張達權死亡為由申請配偶死亡津貼。我委請勞保局代向家屬轉發詢問信函，但未獲任何回應。只能猜想張達權若不是雇主身分的水電小包商，就是點工計薪的外包工人，不曾加入勞工保險。依台灣自雇自營者也會加入職業工會的習慣來說，後者的可能性較高。

只要取得當事人同意，即約時間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每次至少一小時，並全程錄音，留下當事人的口述記憶。

查訪家屬的過程，總帶著時間的急促感，此時不做日後更不可能。我於 2018 年下半年先後訪問 331 工殤家屬，記錄事發至今五個勞動家庭的生活狀況，又於 2021 年 10 月、11 月間再進行部分補訪。以下是 331 家屬的證詞，記錄工殤事件對勞動家庭的影響：

（一）331 工殤的五個勞動家庭

331 大地震時，約有兩百名工人在大樓內工作，當日的媒體報導多所誤植，台北 101 內部也無保留五名工殤者的工作內容、職災類型、補償處置、及家屬連絡方式。此次我一一追蹤亡者家屬進行訪談，輔以新聞資料的比對，總算拼湊出 331 地震當時的現場工殤圖像：

強震來時，在工地 56 樓高的塔式吊車（塔吊），吊臂螺絲被震斷，塔吊及人字臂鋼鐵從高空摔落。受僱於神洲建機的兩位塔吊操作員：陳信陽連人帶車從頂樓墜落 6 樓群樓頂，陳又禎則直接墜落地面；捷祿機械工程所聘僱的林建成，正在 56 樓懸空施作鋼骨組成，遭斷裂人字臂吊桿橫移擊中墜地；同樣受僱於捷祿機械工程的陳錦水，遭壓鷹架吊重的石頭砸到，身繫安全索懸空掉落至 48 樓層。雖非當場致命，但地震時所有人皆忙於逃命，直至餘震稍歇才有人徒步上高樓救他脫身並揹下樓送醫急救，錯過急救黃金期而於次日凌晨過世；欣菱工程空調聘雇的助理工程師孫同英，強震來時，從工務所四樓向外奔逃途中，遭到砸進裙樓內部、貫穿樓層的配重塊擊中身亡。

五名工殤者的基本資料以及訪談對象的親屬列表如下：

	陳錦水	林建成	孫同英	陳信陽	陳又禎
往生年紀	56 歲	24 歲	24 歲	32 歲	33 歲
投保單位	捷祿機械	捷祿機械	欣菱工程	神洲建機	神洲建機
工作職稱	鋼骨組成工	鋼骨組成工	助理工程師	吊架操作員	吊架操作員
投保薪資 (新台幣)	24,000	16,500	22,800	42,000	42,000
職災過程	懸空 54 樓高施作鋼骨組成，遭壓鷹架吊重的石頭砸中，身繫安全索懸空於 48 樓層	懸空於 54 樓高施作鋼骨組成，遭斷裂人字臂吊桿橫移擊中墜落地面	從 4 樓工務所脫困途中，遭高速墜落的塔吊配重塊重壓	連人帶車從 56 樓高的塔吊，墜落 6 樓群樓頂	從 56 樓的塔吊車內，直接墜落地面
家庭狀況	已婚 / 四個兒子	未婚 / 與哥哥台北租屋	未婚 / 台科大半工半讀	已婚 / 女兒剛出生十天	已婚 / 太太懷胎三個月
原居處	桃園	高雄	台北	新北	新北
受訪的 工殤家屬	二兒子 大兒子	媽媽 哥哥	堂弟	姪女 媽媽	大哥 妻子

表 1、工殤者基本資料及訪談親屬列表（顧玉玲製表，2022/1/9）

事發當時，24 歲的孫同英尚就讀於台灣科技大學夜間部機械科三年級，³⁰他於軍中退役後就到工地半工半讀，從事文書工作；同樣 24 歲的林建成，經哥哥林見信引荐從高雄大寮北上共同工作、賃屋同住，地震來時，哥哥親眼目睹吊在頂樓的林建成從半空中墜落。兩位塔吊員陳信陽與陳又禎都才三十歲出頭，已婚，事發前五天，陳信陽的女兒剛誕生，而陳又禎的太太才懷胎三個月。至於最年長的 56 歲陳錦水，妻子當時因精神衰弱在家休養，四個兒子都未成年，老大正在當兵，最小的才唸國小：

爸爸走得太早，大哥還在當兵，我 18 歲就要承擔家裡沒有長輩的擔子，兩個弟弟在唸書，我只能撐下去。那時年輕不懂事，拿到補償金就受騙投資失利賠掉一半。苦了很多年，弟弟都開始工作家裡才

30 331 地震次日起，幾乎所有的媒體都誤植孫同英為「北科大」（台北科技大學）學生，直至四月三日才出現台科大（台灣新生報 2002/4/3）。

好過一點。(陳錦水二兒子)

我國小畢業就出來做事分攤家計，做鋼骨高空作業危險但薪水高，我就找弟弟一起上台北做。弟弟死了，我後來在高雄輕軌夾斷手臂也失業。現在父親住院，媽媽腳受傷在家做回收，我天天醫院家裡兩頭跑，壓力超級大。(林建成哥哥)

孫同英是家裡的獨子，我們年紀差不多，以前會一起出去玩。他過世後妹妹結婚就住娘家附近以方便照顧父母。他父親耳朵重聽又有惡性腫瘤，他母親近年過世了，家裡不想再談這件事，再怎麼難過都二十年了。(孫同英堂弟)

我只有信陽一個兒子，沒法度就遇到了。我本來在附近的電子廠工作，後來工廠收起來去大陸，就失業了。他爸爸是做土水的，少年做到老，老了做一天沒一天，很艱苦。疫情期間生病過世了。(陳信陽媽媽)

我和兩個弟弟從小就知要自己打拚，分擔家計。又禎高中就半工半讀，當兵回來學做衣打版，又跑業務，經朋友介紹開塔吊，薪水較高。老婆懷孕後他拼命加班，想給家人好的生活。(陳又禎大哥)

遽失親人的衝擊，對這些勞動家庭都造成了經濟及情感的莫大衝擊。沒有兒子依靠的老人，失去丈夫的孕婦，父親過世弟弟尚幼的青年……經濟弱勢家庭的骨牌效應，就是地基脆弱，每一處崩塌都會牽動更大的陷落。

職災補償的金額不管多寡，都不足以承擔失去家庭中主要生計來源的缺損。而這缺損，不只是經濟的，還有老邁雙親或幼兒的照護責任，抽掉家中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打亂整個勞動家庭的人力配置。孫同英和陳信陽都是家中獨子，年邁父母受到的身心衝擊都很強烈，難以負荷。林建成和陳又禎過世後，家中負擔都落到哥哥身上，也造成兩位哥哥身兼多職，除了負擔自己的家庭，還要獨自挑起原生家庭的重荷。至於陳錦水的大兒子，當時才 18 歲，家中沒有長輩可以商量，父親的職災補償金就因投資失利而賠掉大半。事發至今二十多年了，331 的餘震仍在這些勞動家庭盪漾，生者繼續打拚討生活，漫漫餘生都帶著失去親人的空缺，在更形脆弱的現實處境，想辦法活下去。

（二）被留下來的人

創傷難以治癒，只能暫時安置。勞動底層的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中，帶著各自不同的創傷繼續前進。此次訪談，很意外的是，很多家人一談起亡者就停不下來，述說亡者彷彿是梳理創傷的方式，他們說著就流下淚來，有時描述亡者活著的時光，也忍不住輕輕笑起來了。二十年拉開的距離，可以哭也可以笑，生活從來不是容易的，一關一關過。

1、現在想起來就會哭

他的個性好，脾氣好，朋友多，很孝順。開始做事後，母親節拿一萬多給我，我說你才退伍自己留著用，他說那我和朋友去喝酒花用了哦，我說錢拿來放我這邊，他說這樣就對了嘛。（林建成媽媽）

他真的很乖很聽話很有孝心，結婚以前每個月都拿一萬元給我，工作也很努力。唯一的兒子走了，現在想起來就會哭。（陳信陽媽媽）

他不菸不酒，什麼都好，只愛打電動。懷孕以後，他常加班要讓小孩子過好生活，我們說好要請假去香港看我奶奶，機票都訂好了，只差一天，他就出事了。（陳又禎太太）

這些愛的話語，我幾乎無法再多加詮釋。也許是相較於死亡的不可挽回，亡者在家人的記憶中，都留下最正面的記憶，「孝順」、「愛家」幾乎是共通點。許多勞動者使用努力工作、增加收入，作為對家人表達愛的方式。那些在大型營造業的工程款中根本微不足道的一萬元孝親費、讓小孩過好生活的加班費，是他們拚命攢給家人的具體回饋。他們在青壯年驟逝，留下的新生兒、未出世孤子，或是甫成年就要承擔家計的孩子，還有已然年邁有待照養的父母，都成為活下來的人的難題。

2、整個家族就這樣散掉

又禎死時老婆才懷胎三個月，有人勸她拿掉孩子免得未來單親照養很辛苦，但為母則強，她還是撐下來了，在娘家附近買房子、養孩子、找工作。我們家人都很感謝她。（陳又禎哥哥）

兒子死了以後，他老婆就帶著出生沒幾天孫子搬出去，都沒有連絡。

那時候我每天掉眼淚，很艱苦，就一天過一天。（陳信陽媽媽）

我每次地震就會想到爸爸，很難受。父親家有七兄弟，他原本扮演大家族中的和事佬，突然過世後，不到一年奶奶也跟著走了，兄弟們很少連絡，整個家族就這樣散掉。（陳錦水二兒子）

一個人離開人世，留下來的人立即要面對生活條件轉變的衝擊：親子養育缺乏奧援，婆媳之間沒有緩衝，原先在家族中扮演角色的消失，都帶來生者不斷調適的痛苦。陳又禎留下遺腹子，懷孕的太太必須依靠娘家的支持養大孩子；新婚的陳信陽家裡，婆媳衝突因為他的缺席而直接撞擊，關係斷裂至今；中年的陳錦水原本扮演大家族裡的重要連繫人，他過世後，悲傷的老母也跟著辭世，四個兒子年紀尚輕，整個父系家族就這樣散落四處。這麼具體的生活改變，無法以金錢計算，再多的賠償也難以衡量。千頭萬緒，悲傷隱藏在後面，經常無以言說。

3、我寧可死的是我不是他

很難受，很不捨，常做惡夢，現在和你講到這個我就流淚了。他是脾氣很好的人，對朋友家人都好，我帶他來做這一途，他遇到了劫數，我寧可死的是我不是他。他這麼年輕，正要出頭，就走了。（林建成哥哥）

我弟弟 170 公分高，遺體被裝在不到 120 公分的屍袋裡，我去認屍，血肉模糊只能認內褲。每天都見面的人，隔天下午就變成……，後來整整一年我都睡不好。（陳又禎哥哥）

331 大地震時，林建成的哥哥從蓋到一半的大樓工地脫逃的過程中，親眼目睹弟弟遭鋼片重擊從高樓向外摔出直墜。不過幾秒鐘的事，成為他爾後多年在沉睡時不斷重返的夢魘，他在睡夢中尖叫、流淚，不知所措。陳又禎哥哥則代表家人去認屍，目睹支離破碎的屍身，承擔最痛苦的記憶，至今歷歷在目，長期失眠，菸癮纏身，代替他說不出口的話語，化成煙霧。創傷難以言語、無法表達，發生當下，當事人多是麻木未覺，要延遲至日後出現（Caruth 1996）。對 331 工殤家屬來說，他們的親人死於一場全台灣人都透過媒體目睹的大災難，但真正的創傷卻要到事件告一段落，大眾開始遺忘時，轉以各種變形的夢魘、

失眠等方式，一點一滴反身回滲，令生者一再重覆經歷未完成的創傷。

他們是收屍的人，創傷迎面來襲，二十年後仍纏繞不去，無法以既有的語言表達，只能透過創傷發聲（Lyotard 1990）。現場目睹死亡的人，以尖叫、啜泣、哭嚎等異質的、陌生的聲音來表述，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們的聲音如此陌生，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無法用日常的痛苦來理解，沒辦法以「想開一點」、「你要走出來」達成慰藉。兩位哥哥成爲第一線直面創傷的人，他們要轉譯現實的利害關係給父母了解，但他們自己內在的創傷沒有現成的語彙可以訴說，和正常世界無法溝通，不知情的人也只是皺著眉轉過身去。

後來，他們也不太跟家人說，流淚、惡夢、失眠都是自己的事。這些不被外界理解、承接的創傷，二十年後一經開啓仍是心痛。不一樣的是，他們可以說出：「現在和你講到這個我就流淚了」、「後來整整一年我都睡不好」，不訴說自己的情緒，但能描述那些不由自主的行動。

4、難逃的「劫數」，無用的「法律」

做工仔都是用時間和命來拼。經過生死關，有人運變好了，有人就運很差而一路壞下去。離開台北 101，我書讀得少要轉行也轉不成，只能繼續做最危險的高架工作，最後在高雄輕軌工地發生職災夾斷了手，這也是我的劫數。（林建成哥哥）

大環境不好，大家都必須很努力工作才有辦法。我常對自己的小孩說，以後不要到危險的工地工作，高樓啊什麼的都要小心，千萬不要拿命來賺錢，很可悲。資方蓋了全世界最高大樓，就該用最嚴格的標準要求工安，法律說這樣的防震標準合法，律師說要告也告不贏，我們就算不服氣也只能算了。（陳又禎哥哥）

林建成哥哥是 331 工殤的倖存者，離開台北工地返回高雄原鄉，還是「繼續做最危險的高架工作」，直到他在高雄輕軌工地勞動時，左手遭機器嚴重夾傷，失去大姆指而餘四指接回後扭曲失能，在就業市場更降一級。他自認是「運很差而一路壞下去」的人，對於工地上接二連三的職業災害，他稱之爲「劫數」：工人賣命工作，拚過了，沒傷沒死還能養家，就算倖存；拚不過就是命一條。

陳又禎哥哥當年代表父母出面，負責處理繁瑣的職災賠償談判，很多人

都建議他要保留刑事追訴權，高樓遇地震，不只是天災，還有人禍，塔吊車的螺絲鬆脫就證明防震不足。但最終，「法律說這樣的防震標準合法，律師說要告也告不贏」，他只能接受資方的理賠條件。即便是 331 這麼重大的案子，也未能討回公道，這樣的挫敗也成為他的社會創傷之一，深覺法律之前並非人人平等。

兩位親歷創傷的哥哥，一個談「劫數」，一個說「法律」，但在我聽來，幾乎是同義辭，都是階級弱勢者對社會不平等的切身控訴。營造科技一直在進步中，但每一個未考量勞動人權便拔高競利的設計，每一種未配置安全衛生措施的工作環境，都成為工人的劫數。很多人上工前就知道工地不夠安全，大家輪著出事，出事了未必得到好的照顧與補償，資方也沒受到處罰，下一次職災簡直只是或然率的問題。

林建成哥哥自嘲地說：「做工仔就是用時間和命來拼。」陳又禎哥哥多年後仍氣憤難平：「千萬不要拿命來賺錢，很可悲。」亡者已逝，但家屬繼續活著，以其受創經驗見證了社會不公平，並使用不同的語彙詮釋命運與法律，成為他們獨特的主體，不應被忽視，也不能被視為只是傷心人的「認命」之說。工殤家屬說著傷心、失望的話語，「運很差」是對職災慘酷的陳述，「不服氣」則是對司法不公的意見，他們都傳達了對事件認知的積極主動性。他們見證過命運的劫難、法律的殘缺，從而也確認了自身的創傷主體（Caruth 1996; Agamben 1999; Malabou 2012）。林建成哥哥怪罪自己學歷不高難以轉行，寄望三個孩子好好升學，「相信文憑才能夠脫離以勞力換取金錢的生活」（曾達元 2024/8）；陳又禎哥哥則勸誡自己的孩子「以後不要到危險的工地工作」，反映的無非是自知此生沒能繞過險境，法律保障不足，但願下一代脫離勞動階級。當代工人對於自身身分的否定，就是對現況最大的控訴。

（三）閱讀伙伴碑的家屬視角

從 331 大地震到伙伴碑完工，歷時五年。工殤事發突然，伴隨著死亡的創傷，還有職災補償、殯葬後事等待忙，有的父母年邁不便出面，委交在台北的表舅或叔叔；也有的妻子尚有身孕，由兄姐代理；有的家中長輩擔心被騙，交給較有文書能力的親戚處理等，著實沒有餘力再投入工殤碑籌備工作。家屬雖同意建碑，但心情複雜，有的怕勾動回憶難以收拾情緒、怕長者不堪承受、怕

幼子被貼上標籤等，寧可將工殤封存在記憶抽屜的底層，不多攪動。說到底，建碑來自工運團體的運動訴求，捉緊勞資政三方協商，而工殤家屬相對被動，即便被通知開會，也多婉拒出席，只有陳又禎的哥哥、陳錦水的大兒子、林建成哥哥參與過數次建碑籌備會議，前者也擔任揭碑時的發言人。

多年後，對於台北 101 伙伴碑，工殤家屬們又如何看待呢？

1、有人還記得他很感謝

我是舅舅過世那年出生的，常聽媽媽和外婆說舅舅的故事，也知道台北 101 有個紀念碑，有一次在附近就特地繞過去看，有看到名字，後來也會跟同學說。（陳信陽姪女）

我不知道伙伴碑的事，平常很少去台北 101，也不太想去。現在知道有一個紀念碑，那我下次會去看看。有時候會想起我們以前去夜遊、一起出去玩的事。（孫同英堂弟）

我很少離開大寮，台北只有 331 地震後去過那一次，路上口渴要買杯冰水都好貴，捨不得買。建成死了到現在沒有再去，也不知道紀念碑。有人還記得他很感謝。（林建成媽媽）

我知道有紀念碑，但沒空去看，沒時間，要賺錢，只有一次和朋友經過台北 101，特地繞去看了一眼，有看到弟弟的名字，也沒什麼，就這樣看到了，知道了，也沒什麼特別感覺。（林建成哥哥）

我當年有參與過建碑的討論，把父親他們的工作記錄下來很好，我覺得很重要。但我自己不願意去看，到現在我從來沒靠近過台北 101，那是傷心地，不想碰。（陳錦水大兒子）

家屬大多知道伙伴碑，但反應各自不同，由於幾乎沒有參與籌備，對紀念碑多半是有距離的。長輩對此事沒什麼回應，也不多過問，相較於具體的賠償金額，工殤碑似乎太遙遠，居住在偏鄉的林建成媽媽，甚至很難想像台北街頭的琉璃牆上有她兒子的姓名。年輕的同輩、晚輩比較能接受「被歷史記住了」的重要性，如同孫同英堂弟知道伙伴碑的存在後，「下次會去看看」，找到親人的名字，好像比較有點感覺，有個足以投射記憶的實物。特別是年少的陳信陽姪女，出生後不曾見過舅舅，但聽聞伙伴碑上有親人名字，就會在逛街時「特

地繞過去看，有看到名字，後來也會跟同學說」，好像因此和什麼重大事件有了點關係，關係的距離反而成為好奇的起點。

就算是籌備初期曾經親身參與討論的人，對於五年後建碑的反應也並不切身。林建成的哥哥表示「沒時間，要賺錢」，生活已然承擔很具體的經濟壓力了，但他難得北上，還是「特地繞去看了一眼，有看到弟弟的名字，也沒什麼」。雖然是沒什麼，但林建成的哥哥作為直接目睹 331 工殤的當事人，當年的雜亂工地，如今的繁華商圈，台北東區並非他習慣消費之處，特地搭車去看伙伴碑，還是很「有什麼」的吧。只是創傷失語，沒有現成的言語得以陳述。陳錦水的大兒子在理性上認同建碑很重要，也知道過程中協商許久，但情感上未必經得起傷心波動，將失事地點視為「傷心地，不想碰」。對他來說，整個台北 101 大樓都是工殤陰影，至今不願靠近。

家屬們提及伙伴碑，多數還是會「特地繞過去看」。至於看了會有何反應呢？我猜測若是紀念碑很隱匿、不起眼，家屬多少會覺得失望，甚至生氣吧？即便是耀眼如伙伴碑，多數家屬的感受可能和林建成哥哥一樣「覺得沒什麼」。但又要有什麼呢？個人的思念一直如影隨形，公開的悼念則很遙遠，若沒有人可以說明、對話、討論，就很難找到意義感，只能隱藏、壓抑（Halbwachs 1980; Metz 1987）。也許最貼近的，就是林建成媽媽說的：「有人還記得他很感謝。」紀念碑存在的意義，主要還是能被社會記住。

工殤碑對一般人來說，是歷史事件；對家屬來說，投射他們的思念與哀悼，若缺少儀式性活動、藝術性轉化的過程，大抵上就是一個寫有親人名字的物體而已。

2、建碑意義的轉化：排斥—接受—認同

當初知道建碑，心裡覺得莫名其妙，人都死了建碑有什麼用？揭碑時也沒去看，頭幾年完全不想去台北 101，但我後來特地跑去看過兩次，有看到爸爸的名字和其他人。十幾年來大家都慢慢淡忘，現在我就覺得紀念碑是有意義的，至少，把歷史記錄下來，他們的痛苦被看見，讓大家知道蓋台北 101 有這麼多人的貢獻。（陳錦水二兒子）

當時有聽說過紀念碑，但不想去看，會排斥，怪怪的，連台北 101

都不去，有意識地遠離那個區塊，免得勾起傷心事。這幾年比較平靜上網查 331 事件，發現網路上相關的資料很少，也許是被資方掩蓋掉了，已經沒什麼人知道了。幸好還有紀念碑，以後會讓孩子去看看爸爸的名字。（陳又禎太太）

創傷記憶是有時間落差的。喪失至親的心情，對建碑紀念的反應，陳錦水的二兒子當時尚未成年，很清楚自己歷經三個階段：第一是抗拒、排斥：「莫名其妙，人都死了建碑有什麼用？」青少年對形式化的抗拒，完全不想接近傷心地；第二是好奇、接受：建碑數年後，他已然投入職場，有自身勞動經驗的參照，「特地跑去看過二次，有看到爸爸的名字和其他人」；第三是認同、肯定：十餘年後，因為「大家都慢慢淡忘」，也因為自身的勞動經驗，他驚覺到歷史逐漸被遺忘，因此對伙伴碑有了新的看法，認為「他們的痛苦被看見」、「讓人家知道蓋台北 101 有這麼多人貢獻」。

陳又禎太太當時懷有身孕，婆家為了保護她，不讓她到現場認屍，也協助她使用補償金搬至娘家附近生育小孩，受到娘家婆家雙方的照顧。作為未亡人，紀念碑的公共性對她太複雜，「不想去看，會排斥，怪怪的」都是十數年後心情較為平復才說得出口的話；台北 101 像禁地般，即便走入東區都「有意識地遠離那個區塊」，怕傷心事被勾動。多年後她也曾主動上網查詢 331 工殤事件，卻察覺「已經沒什麼人知道了」。原本是自己失去所愛的傷痛，不太願意與外界互動，但數年後得知大眾遺忘的速度之快，又令她感到激動，因而說出「幸好還有紀念碑」。雖然自己還提不起勁主動去看，但她認為孩子長大以後應該要去看看伙伴碑，畢竟是父親的記憶。

我在饒河街夜市工作，有時親友北上會帶他們去逛逛台北 101，自己在外抽菸就會繞去看看伙伴碑。建碑的意義我都理解也很感謝，但最好不要再生這樣的事，工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陳又禎哥哥）

由於持續關注工殤議題，陳又禎哥哥是當年揭碑時唯一出席的家屬，二十年來，他也是最積極重返伙伴碑的人。³¹ 他到台北 101 逛街，也會「繞去看看

31 《從 0 到 101》中，林鴻明曾提及有位家屬在伙伴碑點燈時，表示亡者小孩以後長大了，將帶他來看父親的名字（胡芝寧 2022: 227）。這位家屬，指的就是陳又禎的哥哥。只是林鴻明混淆了林建成兄弟、陳又禎兄弟的故事，又將兄弟角色互易。親眼目睹弟弟自高樓掉落的是林建成的哥哥，伙伴碑點燈時表示未來要帶弟弟小孩來看的，則是陳又禎的哥哥。在此一併校正。

伙伴碑」，對他而言，過去的傷痛與現在的繁華是並存的。他對伙伴碑的認識，早已超越悼念弟弟的個人情懷，而拓展至所有的工人安全，建碑不只是爲了自己的家人，更是爲整個社會。以碑爲鑑，以紀念作爲警惕，「最好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才是他認爲最重要的事。

相較於死亡的創傷，紀念碑有什麼用呢？大部分的家屬都這樣想，就算同意也只是被動地不反對。直到整個社會不再關注此事，新的台北 101 繁華記憶覆蓋了舊的工地傷痛，整個社會遺忘的速度太快，家屬才對伙伴碑產生新的情緒反應，接受它作爲集體記憶的物質性存在。這同時也印證了紀念碑的雙面刃性質：一方面，人們以建碑留下記憶，不願被輕易遺忘；另一方面，人們認爲已經建碑紀念，就放心地離開這個事件，以紀念物替代了記憶的道德責任，反而加速失憶（Young 1993; Huyssen 2003; Simine 2013）。遺忘在集體中切出一條界線，使記住的人更痛苦，因爲必須獨自承擔，且無法對人言說。本研究重返 331 工殤事件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唯有持續的討論、行動，才得以免於集體失憶，受創的人也才有機會得到聆聽——就算辭不達意也好。

二十年來，很多家屬都經歷了第一階段的「排斥」、第二階段的「接受」，主要的轉變是時間拉長了，遺忘的危機使家屬對伙伴碑有了留下記憶的期待，不管是自己跑去看，還是未來讓孩子去看，都是初步的接受紀念碑「與我有關」的事實。若建碑後整個社會不聞不問，工殤家屬對於公開悼念就會在「排斥」到「接受」之間猶疑不定，伙伴碑也終究只能成爲台北 101 的錦上添花：讓名列前茅的出資者帶著兒孫來找到紀念碑上自己的名字，「與後代分享成就感」（胡芝寧 2022: 226），而失去哀悼省思的最初意義。

至於，工殤家屬是否能走到第三階段的「認同」，就不一定了。認同來自與相同處境的他人連結，從陳錦水二兒子「看到爸爸的名字和其他人」，哀悼的對象成爲複數；陳又禎哥哥強調「工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紀念的意義因而指向未來。工殤家屬以其存在與生命經驗，藉著訴說創傷，重建主體經驗，而這經驗，是社會性的，並不只限於個人體會。不管是對個人命運的感嘆，還是對集體制度的不滿，都是對現狀的否定與抵抗，331 工殤是瑪拉布（Malabou 2012: 155）提出的第三類社會政治性的創傷（sociopolitical traumas）。即便事隔二十年，家屬提及死去的親人，仍圍繞在事件的社會意義，以及其延伸的集

體現象。揭碑點燈時，陳又禎的哥哥指出，伙伴碑的意義在於「勞工有更多的人身保障，他們的生命絕對不比任何人來得貧賤。」工人不是英雄，也毫不貧賤，工殤已然發生，若能提醒未來勞安，保障工人性命，紀念才有意義。公開的哀悼既是撫慰生者，也得以警惕未來。



圖 6：伙伴碑早已是台北觀光人潮的重要打卡景點。顧玉玲攝，2023 年



圖 7：伙伴碑名單，冠蓋雲集的排名第一列。顧玉玲攝，2023 年

六、結語：建碑民主化以促成紀念公共化

討論工殤碑，特別是建碑至今將近二十年的伙伴碑，由於事故發生的社會氛圍與現在已大有不同，如何還原事件本身，要依賴當時的檔案資料，但如何閱讀及詮釋檔案，不免都是透過現在的視框。研究過程中，我以新聞資料回溯發生於 2002 年的 331 工殤事件，比對災後的工安報告，指出後續的災難立法及作用。再針對建立台北 101 伙伴碑的協商過程，透過建碑會議記錄整理勞資雙方主張，以口述歷史補充工殤家屬的觀點，再加上踏查現場的空間配置及 101 面對社會大眾的官網及出版資料，豐富創傷記憶的探究向度。

伙伴碑的建立，來自當時重大災難的輿論壓力、工運團體的有效介入，偶然地促成官、資、勞的合作。由於協商並非來自工人自身的力量，偶然性因素可能因為時間延宕而失去效應，因而沒能納入更多社會連線——或者說，當時的台灣社運也沒有足夠的能量相互支援。最終，雖然在三方角力下設立伙伴碑，在碑文、宣傳、詮釋等，卻暴露了台北 101 業者的有意遮掩，這正反映了當時勞資力量的懸殊，以及社會運動中橫向連結的社群認同尚未建立。針對家屬的創傷與公開悼念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如下：

（一）排斥—接受—認同，當事人的創傷需要集體支撐

失去至親的痛苦，活下來的人欠缺足夠的語彙訴說創傷，留下失眠、惡夢、流淚與尖叫的異質聲音，這些來自創傷的異質聲音，需要被聆聽、承接，建立創傷主體的正當性，正視那些「劫運」、「告不贏」的挫敗感。肯認弱勢者以生命經驗提出對制度的控訴，看似認命喪氣，實則頑強不曾放棄。個人的思念若沒有集體記憶的支撐，沒有社會網絡的扶持，未經過公共性的肯認，很難找到意義感。若這個社會對重大工殤，只是賠錢了事，沒有進一步的反省與改變，死去的工人將成為統計數字上的一個零頭，只能怪他命中有劫數。

工殤家屬的創傷需要時間沉澱與轉化，從個人思念到公共紀念之間，可能歷經排斥—接受—認同的漫長過程，還不一定能夠真正走過，且每個人的社會條件、與亡者的連結也各自帶來不同的時間差。面對伙伴碑，工殤家屬的心情很複雜。他們的親人死於一場全台灣人目睹的災難，建碑紀念看起來沒有任何實質幫助，除了被捲入籌備討論的人之外，其他家屬雖不反對心中也不免懷著

「排斥」的質疑。沒料到，他們後續的痛苦卻來自社會大眾的快速遺忘，當家屬們意識到集體已逐漸遺忘 331 工殤，才開始「接受」伙伴碑，希望留下亡者生前的勞動記錄。但由於未完成的哀悼，也令許多人裹足不前，也許更需要行動的契機。部分家屬有機會參與籌備建碑的討論，或因自身勞動經歷的參照，在有限的社群經驗中，建立與類似處境的他者的連結，對伙伴碑才有了「認同」，從個人擴大到集體，認為紀念不只在過去，也在對未來的警惕，不要再有憾事發生。

（二）建碑是哀悼公共化的起點

記憶的「集體性」與「現在視框」同等重要，在重大創傷事件中尤其明顯。面對伙伴碑，親近家屬的心情很特別，既難有觀光客的興奮感，也缺乏一般人的好奇心，但只要心情得以克服陰影，幾乎都會到現場觀看。現場又是什麼呢？如果整個社會不再提及此事，急著往前走、向前看，受創的人就像被留在原地，就算曾經上了好幾天頭條新聞的 331 工殤，如今人們只看到耀眼的台北 101 跨年煙火秀，卻無人記憶二十年前的工殤，家屬也會有失落、被遺棄感。點燈不如煙火，卻也是不可輕忽的存在，或者說，只要讓繁華外表下還有芒刺在背的不適之感，也就足夠了。紀念碑也許無以撫慰創傷，卻是具體的記憶依附，留待意義的流轉變遷。

建碑是公共化哀悼的起點，二十年來，331 工殤猶然是尚未完成的哀悼。伙伴碑承載了集體記憶，需要公共化的儀式與互動，召喚集體記憶的警惕，並時時更新社會意義。而工殤家屬的創傷，也唯有置放入公眾歷史中，才能得到轉化的支撐力量。這種雙向的改變與轉化，不會自然而然在時間流中出現，必須仰賴有意識地創造條件，有足夠的社會關注來錨定紀念價值，才得以承接個別創傷的挫敗、夢魘與失落。而親人死亡的意義，若帶有為眾生犧牲、化度來人的積極作用，家屬也才得以超越創傷，得到安慰。

（三）集體記憶的明暗相倚，矛盾共生

台灣戰後至今「拼經濟」一直是社會主流，整個社會都緊盯著經濟成長曲線，不免漠視發展的代價，或視這些代價為必要風險。職是之故，工殤碑雖佔據了公共空間，但甚少受到社會矚目與討論，因而也長期維持了主流價值所欲

傳遞的單一敘事。伙伴碑占據了都市重要的空間，就可能拉出更多行動的可能，疊加更多元活潑的當代詮釋，建立新的社群認同。紀念場址的變化，相關當事人及社群關係的今昔之比，都共同形構伙伴碑在當下的社會意義。

訪談過程中，許多工殤家屬都說出相同的期待：希望人們知道，逝去的親人曾對台北 101 付出巨大貢獻。他們肯定台北 101 作為重要地標，但更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死亡的陰影。事物是矛盾共存的，單方面遺忘或遮掩死亡，只會令他們更不願靠近這座摩天大樓，傷心地也永遠只能是傷心地。集體記憶若只聚焦在高樓的消費亮面，卻迴避建造過程的犧牲暗面，才是真正的殘酷不仁。工殤家屬所認知的台北 101，毋寧更接近一種「不要只看到台北 101 的光鮮亮麗，也要知道有人為了建造而死去」的心情。他們不願唱衰摩天大樓，但也無法單純引以為豪，對這個台北重要地景，家屬懷有更複雜多層次的理解：穿透事物表面，直視悲欣交集的人生，明暗互為主體。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大紀元 (Epoch Times)。2002/7/18。〈台北國際金融中心正式更名為 Taipei101〉“Taipei guoji jinrong jhongsin jhengshih gengming wei taipei101” [Taipe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Officially Renamed Taipei 101], 《大紀元》*Da jiyuan [Epoch Times]*。http://www.epochtimes.com/b5/2/7/18/n203159.htm。on May 22, 2023.
- 工委會 (Workers' Legislative Action Committee)、工傷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the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2002/4/26。新聞稿“Sin wun gao” [Press release]。
-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Fu Tsu Construction Co., Ltd.)。2012。《台灣營造業百年史》*Taiwan yingzaoyeh bainian shih [A Century of Construction in Taiwan]*。台北 (Taipei): 遠流 (Yuan-Liou Publishing)。
- 孔憲法 (Kung, Shiann-Far)。1990。〈金門風獅及其與聚落關係初探〉“Jinmen fongshih ji chi yu jyuluo guansi chutan” [Kimmen Feng-Shih-Yeh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ettlem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Guoli taiwan dasyueh jianjhu yu chengxiang yu yanjiu syuehbao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1): 29-39。
- 台灣新生報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2002/4/3。〈孫同英不幸罹難，台科大發起募捐〉“Sun tong ying busing linan, taikeda fachi mujyuan” [Sun Tong-Ying Unfortunately Passes Awa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itiates Fundraising], 《台灣新生報》*Taiwan shinsheng bao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 第四版 [Page 4]。
-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Financial Center Co., Ltd.)。2018/6/5。〈(107) 行字第 10705018 號函〉及附件剪報“107 sing zih di 10705018 hao han ji fujian jianbao” [Letter No. (107) 10705018 and attached clippings]。
- 林淑玲 (Lin, Shu-Ling)。2002/4/1。〈馬英九與陳定南、余政憲為地震問題槓上，游揆滅火〉“Mayingjiou yu chendingnan, yujhengsian wei dijen wunti gang shang, youkuei miehhuo” [Ma Ying-Jeou and Chen Ding-Nan Clash Over Earthquake Issues; Premier Yu Takes Action], 《中國時報》*Jhongguo shihbao [China Times]*。Retrieved from: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331/main.htm on Sep 8, 2022.
- 林鴻明 (Lin, Hong-Ming)。2022。〈實現夢想、超越夢想的旅程〉“Shihhsian mongsiang, chaoyueh mongsiang de lyucheng” [The Journey of Realizing and Surpassing Dreams], 《從 0 到 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Tsong 0 dao 101: dazao shihjieh tianji sian de lyucheng [From 0 to 101: The Journey of Building a World Skyline]*, 胡芝寧 (Hu, Zhi-Ning) 著, 頁 25-29。台北 (Taipei): 遠見天下 (Global Views -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苦勞報導 (CoolLoud Report)。2007/4/30。〈101 大樓因勞工才續紛 勞動伙伴碑點燈〉“101 dalou yin laogong tsai binfen laodong huoban bei diandeng” [The 101 Building Shines with Labor; Labor Partner Memorial Lights Up], 《苦勞網》*Kulaowang [Cooloud]*。Retrieved from: http://www.cooloud.org.tw/node/58275 on Apr 24, 2023.
- 胡芝寧 (Hu, Zhi-Ning)。2022。《從 0 到 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Tsong 0 dao 101: dazao shihjieh tianji sian de lyucheng [From 0 to 101: The Journey of Building a World Skyline]*。台北: 遠見天下 (Global Views -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財富時報 (Fortune Times)。2008/9/25。〈林鴻明: 站在台北 101 之巔〉“Lin hong ming: jhanzai taibei 101 jih dian” [Lin Hong-Ming: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aipei 101], 《新財經》*Sinlang tsaijing [Sina Finance]*。Retrieved from: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sxyrw/20080925/17575343824.shtml on May 22, 2020.

- 高橋俊介 (Takahashi, Shunsuke) 著, 姚淑娟 (Yao, Shu-Juan) 譯。2009。《摩天大樓建築之謎——從台北 101 發現建築科技的奧妙》*Motiantalou jianjhu jih mi - tsong taipei 101 fasian jianjhu keji de aomiao* [*The Mystery of Skyscraper Architecture: Discovering the Marvels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from Taipei 101*]。台中 (Taichung) : 晨星 (Morning Star)。
- 曹常成 (Cao, Chang-Cheng)。2005。〈建立塔式起重機耐震設計規範〉“Jianli tashih chijhongji najihen sheji gucifan” [Establishing Seismic Design Standards for Tower Cranes], 《工業安全衛生月刊》*Gongyeh anchyuan weisheng yuehkan*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Monthly*] 191: 29-40。
- 張學舜 (Zhang, Xue-Shun)。2022。〈打造台北 101 成為台灣當代文明地標〉“Dazao taipei 101 chengwei taiwan dangdai wunming dibiao” [Building Taipei 101 as a landmark of Taiwan’s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從 0 到 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Tsong 0 dao 101: dazao shihjieh tianji sian de lyucheng* [*From 0 to 101: The Journey of Building a World Skyline*] , 胡芝寧 (Hu, Zhi-Ning) 著, 頁 6-10。台北: 遠見天下 (Global Views -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曾達元 (Zeng, Da-Yuan)。2024/8。〈被留下的人〉“Bei liousilai de ren” [Those Left Behind]。《印刻文學生活誌》*Yinke wunsyueh shenghuo jih* [*INK Literary Monthly*] 252: 42-49。
- 黃蒼馨 (Huang, Yi-Hsin)。2008。《共生與疏離—金門風獅爺與聚落之關係》*Gongsheng yu shuli - jinmen fong shih yeh yu jyuluo jih guansi* [*The Symbiotic or Alie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eng-Shih-Yehs and Settlements in Kinmen*]。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Nanhua dasyueh meisyueh yu yishu guanli yanjiuousuo shuoshih lunwun)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esthetics and Arts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 楊俊隆 (Yang, Jun-Lung)。2003。《超高層建築塔式起重機施工安全防災管理之研究—以台北 101 為例》*Chao gaotseng jianjhu ta shih chijhongji shihgong anchyuan fangzai guanli jih yanjiou - yi taipei 101 weili* [*The Study of Safety Management in Tower Crane Operation for High-rise Construction Building - A Case Study of Taipei 101 Project*]。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產業安全與防災學程碩士論文 (Guoli jiaotong dasyueh gongsyuehuan chanyeh anchyuan yu fangzai syueh cheng shuoshih lunwun) [Master’s Thesi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楊祥銀 (Yang, Xiang-Yin)。2004。《口述史學》*Koushu shihsyueh* [*Oral History*]。台北 (Taipei) : 揚智 (Yang Chi)。
- 蔡榮根 (Cai, Rong-Geng), 王森源 (Wang, Sen-Yuan), 楊榮異 (Yang, Rong-Yi), 黃文正 (Huang, Wen-Zheng), 江世雄 (Jiang, Shi-Xiong)。2002/6/5。《台北國際金融中心新建工程 331 震塔吊掉落事故原因鑑定報告書》*Taipei guoji jinrong jhongsin sinjian gongcheng 331 jhenzai tadiao diao luo shihgu yuanyin jiating baogaoshu*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Cause of the Tower Crane Collapse Incid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Taipei City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dustrial Technicians Association)。
- 顧玉玲 (Ku, Yu-Ling)。2002/10/15。〈伙伴碑工作報告〉“Huoban bei gongzuo baogao” [Partner Monument Work Report]。未發表 (Unpublished)。
- 。2008。〈勞動者的血汗印記: 工塲紀念碑與歷史記憶〉“Laodongjhe de siehhan yinji: gongshang jinianbei yu lishih jiyi” [The Seal of Workers’ Sweat and Blood: The Monument for the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shehuei yanjio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2: 229-252。
- 。2020。〈集體記憶的民主參與: 台北 101 伙伴碑個案研究〉“Jiti jiyi de minjhu tsanyu: taipei 101 huobanbei gean yanjiou”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Memory: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ners’ Memorial at Taipei], 《博物館與文化》*Bowuguan yu wunhua* [*Journal of Museums and Culture*] 19: 125-160。

二、外文書目

- Agamben, Giorgio. 1999.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 Assmann, Jan. 2012.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Beverley. 2006. "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Past,"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edited by Chris Tilley, Webb Keane, Susanne Kuechler, Mike Rowlands and Patricia Spyer, pp. 463-479. London: Sage.
- Caruth, Cathy.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nnerton, Paul.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Stephen. 2016. *Vertical: The City from Satellites to Bunkers*. London: Verso.
- Halbwachs, Maurice,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Ditter and Vida Yazdi Ditter. 1980 (1950).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 Harrison, Rodney. 2008.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Conflict in the Use of Herita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Heritage Reader*, edited by Graham Fairclough, Rodney Harrison, John H Jameson Jr., John Schofield, pp. 177-190. Abingdon: Routledge.
- Herman, Judith. 1997.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 Hirst, William, Jeremy K. Yamashiro, Alin Coman. 2018. "Collective memory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2 (5): 438-451.
- Huyssen, Andreas.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otard, Jean-Francois, translated by Andreas Michel, Mark Roberts. 1990. *Heidegger and "the Jew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labou, Catherine, translated by Steven Miller. 2012.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Metz, Johann Baptist. 1987. "Communicating a Dangerous Memory," in *Communicating a Dangerous Memory: Soundings in Political Theology*, edited by Fred Lawrence, pp. 37-54. Atlanta: Scholar Press.
- Ong, Aihwa. 2011. "Hyperbuilding: Spectacle, Speculation, and the Hyperspace of Sovereignty," in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edited by Ananya Roy and Aihwa Ong, pp. 205-226.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 Portelli, Alessandro. 2016(1991).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pp. 48-58. Abingdon: Routledge.
- Roberson, Jennifer. 1991. *Native and New Comer: Making and Remaking a Japanese Coun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ine, Silke Arnold-de. 2013.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Paul. 197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rry, John. 1996.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in *Theorizing Museums*, edited by Sharon Macdonald and Gordon Fyfe, pp. 45-65.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Weisman, Leslie Kanes. 2000. "Women's Environmental Rights: A Manifesto," in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ited by Jame Rendell, Barbara Penner, and Iain Borden, pp. 1-5.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Young, James E.. 1993.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為籌建伙伴碑，勞資政三方代表召開建碑工作小組，自 2002 年 5 月 29 日至 2007 年 4 月 28 日共歷時四年許，由台北國際金融中心公關室留下正式會議記錄共十六次，電子檔案留存於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台北國際金融公司、工傷協會、工委會。以下是第八次會議記錄：

台北國際金融中心建碑工作小組

第八次會議記錄

2002/10/04

出席者：

姓名	相關背景
利梅菊	工傷協會理事
顧玉玲	工傷協會秘書長
張榮隆	工傷協會理事
賀光正	工傷協會秘書
王若麟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本案建築師)
沈雲飛	台北金融大樓 / 副總經理
林純如	台北金融大樓 / 公關

- 時間：民國 91 年 9 月 18 日下午四點
- 地點：台北金融大樓二樓會議室
- 記錄：林純如

壹、討論事項：

1. 建築師提出文字排列大小之建議 (略)
2. 工傷協會提出以紀念碑所在位置的命名——「作夥」(台語)、「夥伴」。

貳、會議結論：

1. 一致同意紀念碑所在位置的命名為「夥伴」。
2. 玻璃材質之紀念碑壁屏高度為不超過 2.4 公尺，其中字體約為 2.3~2.5cm。

下次開會時間及討論項目

1. 討論項目：

- 建築師提出燈光處理、名字排列、地面文字排列之型式建議。
- 小組成員提出地面文字發想。

2. 開會時間預計為 10 月初，屆時將以電話連繫確認開會時間。

3. 開會地點定為台北金融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金融大樓臨時通知：

金融大樓對此作品極為重視，特邀請本案特約風水大師一同討論，風水大師對目前作品深感意義重大，因此建議一個新設置地點，對作品及本案均相得益彰，希望各位小組委員於 10 月 8 日撥冗一同討論。